



## 大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次全体会议  
1996年10月7日,星期一,下午3时  
纽约

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 ..... (马来西亚)  
嗣后:特奎斯特先生(副主席) ..... (巴哈马)  
嗣后:波斯特韦克女士(副主席) ..... (巴哈马)

下午3时开会。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厄立特里亚代表团团长阿默德米卡埃尔·卡萨伊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卡萨伊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我还愿向你的前任、主持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常会工作的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致敬。

大会将同意我的观点,即当今国际关系的特点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存在着通过扩大贸易和投资促进国际合作的普遍愿望和执着的运动。这种趋势同谋求和维护和平与安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们看到在出现这种积极趋势同时并与这种趋势相对立的是,世界各地因不同根源引发而密集程度高低不同的各种冲突大量滋生。因此,谋求建立切实可行的机制,减少并设法永远解决这些冲突,以便促进国际合作,为人类谋福利,这是联合国在今后几年仍将面临的重大挑战。

同样,非洲之角区域也仍然受这种两分法左右。在积极的一面,该区域各国都致力于促进区域合作和继续为此目的而积极努力。迄今为振兴政府间干旱和发展管理局这个实现该目标的区域工具而取得的巨大进展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同时,由于一些会员国的严重国内冲突,该区域仍在流血。破坏索马里社会结构的痛苦流血仍然有增无减;苏丹的内部冲突和全国伊斯兰阵线政权各种活动所造成的区域紧张气氛仍在恶化。

谋求和平与安全及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提供的机会对遭受战争的肉体和心理创伤的各国人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正如大会所知道的那样,我国是长期战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战争造成了大量人类牺牲,使其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满目疮痍。因此,和平对厄立特里亚这个年轻国家弥和战争创伤、重获失去的机会和重建被破坏的一切都至关重要。

但是,我国政府维持和平的热切愿望和决心不断受到苏丹民族阵线政权敌对和无端行为的威胁,这个政权自1989年掌权后不久就开始对厄立特里亚采取对抗和颠覆政策。我无需在此强调指出,这种颠覆和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为不仅仅是针对厄立特里亚的,事实上,民族阵线已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政策,企图通过颠覆和暴力行动在其邻国制造不稳定局势,输出其扩张主义企图。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民族阵线政权支持并为各国的各种恐怖主义分子提供庇护港,并且为他们的破坏和恐怖行为提供便利。在该地区若干国家发生的雇佣军侵入边界的一系列事件中,在国际上赤裸裸的恐怖行为中,喀土穆的黑手隐约可见。

我必须在此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已经尽一切努力,缓和和避免民族阵线政权行为所挑起的紧张局势。事实上,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我国政府耐心和不折不挠地推行积极接触政策,我们抱着渺茫的一线希望,即喀土穆当局会从他们所走的危险道路上回头。

令人遗憾的是,克制和平语言仅仅增加了民族阵线的胃口,将其颠覆的触角伸得更深和更广。事实上,喀土穆不仅拒不接受这些不断的呼吁,反而变本加厉,公然无度地扩大其恐怖和颠覆行为。

我要提醒本大会注意的另一严重事项是苏丹当局虐待厄立特里亚难民的问题。民族阵线政权不仅尽其所能阻挠难民有组织地回归祖国,而且采取不负责和令人遗憾的行动,离间难民与苏丹人民之间的关系,而苏丹人民在长年战争期间曾经热情地接纳过难民。当这种离间政策失败后,民族政权开始动用其保安机构,没收难民财产,任意拘禁、酷刑拷打和放逐难民。更有甚者,青年难民被迫征兵并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利用他们进行跨边界的颠覆活动。这些难民有组织回国计划的实验阶段已经顺利完成,但是民族阵线所制造的不堪一击的借口却阻碍了这个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压力,难民自动回国需要冒很大的危险。

民族阵线政权采取这一切敌对行为的目的是颠覆各邻国,鉴于这些行为涉及到更广泛的区域安全问题,本大会和国际社会应该对这些行为感到严重关注。

此外,请允许我回顾1995年12月也门共和国占领红海南端入口厄立特里亚大哈尼群岛之后厄立特里亚与也门共和国之间爆发的事件。或许由于这一事件的敏感性,事件立即引起国际关注和调解努力。

厄立特里亚政府一向主张进行国际裁决解决争端,厄立特里亚政府立即完全接受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两国政府

以及此后联合国秘书长所做的调解努力,这些努力极大地促进了缓和紧张局势,并为和平解决争端铺平了道路。当法国政府提出斡旋时,厄立特里亚政府也衷心地接受了。

厄立特里亚政府是在也门当局进行无中生有地指控和不负责的宣传以使局势升级的背景下做出这些决定的。此外,有些方面为了既得利益企图混水摸鱼,在这个事件中也推波助澜。然而,真正的愿望和真诚的政治意愿取得了胜利。

最后,由于厉行克制以及小心谨慎地处理问题,加上区域和国际间进行的积极和建设性干预,促使双方于1996年5月21日在巴黎签署了《原则协议》。

在协议中,厄立特里亚国和也门共和国明确地表示它们愿意通过一个仲裁法庭的裁决,解决大哈尼群岛争端。总的来看,签署该文件之后的发展是积极和令人鼓舞的。然而,也门共和国指控厄立特里亚部队于1996年8月10日占领了小哈尼岛,这个事项被仓促地提到安全理事会。事实上,在1996年5月21日签署《原则协议》之前以及之后,厄立特里亚部队就已驻扎在该岛。尽管事实如此,厄立特里亚政府仍然撤走了其部队,以此作为善意的姿态,并且促进仲裁进程顺利进行,维护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

厄立特里亚政府一再声明它将遵守1996年5月21日《原则协议》,并且表示决心接受仲裁法庭的决定。我高兴地指出,双方上个星期即10月3日在巴黎达成的附属协定将使仲裁法庭可于明年年初开始进行审议。

索马里痛苦和无法控制的现实迫使国际社会必须寻求各种途径,加紧结束这个长期、无休止的悲剧。这个局势的复杂性显而易见,无需再次赘述。但很显然,除非索马里人自己认清使该国四分五裂的毫无意义的流血斗争,采取必要行动,促进和平和民族和解,否则外界无论进行多少善意的努力,都不可能帮助在索马里恢复正常状态。当然,该地区各国在这种多方面努力中本来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有连贯性和有协调的区域和国际倡议,因而出现了更多令人费思的消极发展。事实上,现在有迹象表明,各种外部势力日益卷入,这些势力似乎一心想利用这个真空达到其狼子野心。事实上,索马

里日益成为极端主义组织的沃土。为了索马里人民,为了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必须在为时不晚的时候阻止这些趋势,必须恢复区域努力。

中东最近的发展似乎给《奥斯陆协议》笼罩了阴影,这自然引起了所有希望持久地解决以巴冲突的人们的关注。不管该协议有什么不足之处,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代替和平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呼吁双方坚持对话和谈判进程,以保证实现持久和平,确保该地区各国人民的福利。

最后,我们和很多成员国一样认为,急需对联合国的决策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进行改组。安全理事会继续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应该恢复安理会的活力,使它更具有民主性,提高其价值、有效性和合法性,以使它反映本组织的普遍性。很多发言者提出了以下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论点:目前,安全理事会既不是公平的,也不具有代表性。国际政治情况已发生了如此根本的变化,有进行改革的充分理由。

虽然各国广泛希望进行改革,但至今为止的讨论并未真正接近于达成所需要的普遍一致意见。我们坚决认为,灵活性和妥协将是必要的。建议中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以使我们能够试图进行必要的改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富汗外交部副部长阿卜杜勒·拉希姆·加福扎伊先生阁下发言。

加福扎伊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这个崇高职务。

阿富汗人民所忍受的由其他国家所强加给阿富汗的创伤继续为我国造成令人深感不安的后果。对世界来说,它可能只不过是另一个麻烦地点。但对阿富汗人来说,它意味着磨难、痛苦、损失、心理创伤和难以预测的前途。我们不能忘记现在仍然有希望。这个希望存在于国际联系中,即我与其他代表之间的国际联系,并通过这些代表

传达到他们的国民。联合国是建立在这个梦想的基础上的,今天,这个联系在再次形成——它是51次联系。

在阿富汗最近的历史中有两个突出的悲剧日期:1979年12月27日和1996年9月27日。这是两个黑暗的日子,在所有爱国的阿富汗人心中激发起痛苦的回忆。第一个日期使他们回想起前苏联的占领,第二个日期使他们想起有另一个邻国所支持的一支占领军。

今天占领我们的国土的一些地区的军队被称为塔利班——大会在上届会议上对这个名字变得很熟悉。塔利班在夺取喀布尔后采取的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不是袭击一个军营,而是袭击联合国阿富汗办事处。它的第一行动就是破坏联合国建筑物的不可侵犯性,违反了所有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和法律。

这就是塔利班。象欧洲专员埃玛·博尼诺昨天所说的那样,塔利班是一支有可能将阿富汗带回到黑暗时期的力量。国际报界从喀布尔发出的大量报道描绘这样一个图画:一个由国外支持的组织将一种严厉的制度强加于一个极端恐怖的人民。塔利班命令关闭所有学校,停止妇女的一切教育和就业。来自宣传媒介、美国当局和联合国的很多报告谈及塔利班在阿富汗的710亿美元的海洛因出口工业中所起的作用。

1996年10月1日,纽约时报说,仅在喀布尔就有1百万人被投入

“塔利班统治的迷宫中”。

1996年10月3日,路透新闻社说,虽然塔利班试图谋求国际上的承认,但它所遇到的是“怀疑和恐惧”。塔利班在喀布尔的第一周就受到大赦国际的谴责。

以下一段话不是阿富汗政府描绘塔利班占领的话——它是大赦国际的话:

“尽管塔利班领导人的言论有温和的表示,但是很清楚,他们的卫兵们正在忙于在喀布尔实行一种恐怖统治...家人不敢出门,不敢为来人开门,担心他们的亲人会承受塔利班统治的残酷的后果”

大赦国际指责塔利班在首都进行的逐家搜查中逮捕了近千人，并强迫他们穿过前线的地雷区。

法国电视播出塔利班冲进喀布尔博物馆，并毁坏那里的很多独特的文物古迹和塑像。这些文物古迹和塑像属于佛陀时期，是无法取代的。

我所谈到的塔利班受外国激发的仇恨所左右，受外国指定的纲领的指导，并致力于毁灭阿富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这个组织在喀布尔所表现的恐怖打破了所有记录。简言之，塔利班人是雇佣军——是一次强加于阿富汗人民的非法力量。

外国干涉再次成为阿富汗不断进行的冲突的主要原因。目前影响到喀布尔的每一个生灵的生活的恐怖和混乱是外国干涉的直接后果。我们有这方面的确凿证据，我们将在今后将其提交安全理事会以供适当考虑。还有比外国民兵更好的证据来证明存在外国干涉吗？这些民兵是阿富汗伊斯兰国的武装部队最近在战场上捕获的，其中包括一些军官。

阿富汗伊斯兰国坚定地认为，所谓的塔利班是大会1989年通过的《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中所定义的雇佣军的一个最好例子。我们不否认在塔利班运动中有在边界的另一边长大并在那里上过宗教学校的阿富汗青少年，但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塔利班军事人员中的主要团队是由我们的边境另一面的军官和民兵力量组成的，并由企图推翻阿富汗伊斯兰国的军事工业要人供养。

联合国大会1995年12月21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允许或容忍以推翻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为目的招募、资助、培训、集合、转送和利用雇佣军的任何国家。

《联合国宪章》在各条款中敦请所有会员国在各国间发展友好关系，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在1970年10月24日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之际，大会批准了《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其中第一条原则宣布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威胁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1994年12月13日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伊斯兰国家第七次首脑会议、1995年10月18日在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大会1995年12月19日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以及1995年12月9日在几内亚的科纳克里市召开的第23次伊斯兰各国外交部长会议都有力地坚持主张不干涉和尊重阿富汗领土完整与独立的原则，而且坚决主张展开基于真正的阿富汗内部的对话的和平进程。

阿富汗伊斯兰国一再呼吁联合国向阿富汗派遣一个调查团，以查询和调查外国对阿富汗事务干涉的级别、程度和性质，但联合国至今未对此呼吁作出响应，阿富汗对此深感失望。

去年，我们在这一论坛上提供了有关塔利班的情况。但我们困境被置若罔闻。考虑到新闻界以查证后的事实所作的报道以及我们在塔利班遗产问题上的明确立场，我们担心我们的困境会再次被置若罔闻。这甚至比塔利班接管本身更具灾难性。

近如昨天的最新报告揭示了一切有关塔利班攻击我国首都喀布尔周围地区情况的令人震惊的现实和事实。请允许我公布塔利班最近在其外部支持者的帮助下犯下的受包庇和掩盖的罪行。整整26天前，即1996年9月11日，阿富汗伊斯兰国防务部的情报部门截获并录下了塔利班在楠格哈尔和坎大哈之间的一段无线电通讯。通讯内容如下：

“向毛拉舒克鲁拉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告诉新型的APR武器已运抵坎大哈。你应立即将这些毒气武器从托尔哈姆运到楠格哈尔，因为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批配有特殊装备的塔利班武装，他们正等待上述武器。我们只发动一轮攻击就可以获得大片地区。”

仅六天后，即9月17日，我本人将国防部提交给我的这份报告呈送给在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先生主持下召开的全国最高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在我国首都喀布尔以北的布兰大吉市的地堡中举行。我仍记得，在我递交这份报告后，屋里一片沉寂。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传送这份报告也许是为了打击政府军的士气。这个问题因此未得足够的重视。

昨天，我们从在塔卢坎的政府总部得到了一份令人震惊——我重复一遍，令人震惊——的报告，它使我想起了最高委员会的那次会议。阿富汗伊斯兰国官员录下了塔利班在接管喀布尔的前夜，即9月26日傍晚左右在前线阵地上的一次无线电对话。据报告作了下列保证：

“再次请领导人放心，新武器在拉塔班德、班德—拉齐和普利查吉地区取得了良好成果。”

为了各位代表了解情况，我谨说明，这些地区均位于我国首都喀布尔以东。

更令人惊愕的现实是目击证人报告中提供的情况。这些目击证人在事后看到了上述地区。这些目击者说，他们看到大多数躺在地上的政府军士兵的尸体上没有任何子弹或其他武器穿过他们身体的伤痕。然而，他们确实透露，他们注意到政府士兵的鼻子、眼睛和耳朵中都流血。我国政府的一位资深指挥官穆斯林先生在苏联占领期间也曾目睹过类似情况。他说：

“塔利班在前线的进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随后认识到，塔利班肯定拥有某种比我们看到、拥有和知道的武器更先进的武器。”

指挥官穆斯林先生继续说：

“在9月26日傍晚塔利班猛烈攻击拉塔班德地区之前，我们一直未想到化学武器。我收到一份无线电通讯，得知我们的人员遭受了大量的伤亡，但甚至在我下令余下的人员撤退时，我没听到任何回答。我与总部联系，并受命去检查前线。在与前线首次联系后的一小时，我到达了那里。然后我看到萨博尔司令躺

在战场上，牺牲了。我只注意到他的鼻子和耳朵周围有血。萨博尔是我的一位密友。突然，我回想起红军在圣战期间也曾使用过类似武器。萨博尔司令的身上没有任何外部伤痕，我真想把他的尸体带回去。但激烈的战斗使我不可能这样做。”

基于上述情况，阿富汗伊斯兰国坚信，塔利班的外国支持者向他们提供了某种国际禁止的气体或化学武器，在塔利班为夺取首都喀布尔发动进攻时，他们使用了这种武器。他们在喀布尔遇到了有力的抵抗。

我们提请本大会注意这一悲惨事件，并因此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派遣一个调查组调查我提及的这一情况。

阿富汗伊斯兰国一直在向联合国特派团和安全理事会提供有关塔利班军事行动的情报。塔利班有意拒绝接受联合国的和平进程。

阿富汗政府在其1995年9月5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S/1995/767)中警告国际社会，阿富汗有分裂和解体的危险，而且塔利班的军事进展有失去控制的可能性。

阿富汗伊斯兰国在其1995年9月14日致秘书长的信中预测，“这种新的紧张局势的结果是令人忧虑和危险的”，并恳切地呼吁迅速派遣“一个实况调查团前往阿富汗西部，以便在协商时向安全理事会报告。”(S/1995/795, 第2页。)

秘书长在1995年9月22日的一封信中保证，

“联合国继续承诺支持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对贵国的一切外来干涉。我正在应用会员国赋予我的使命，尽我所能解决造成阿富汗不稳定的冲突根源。我将继续对整个和平进程采取全面做法，特派团将在其中继续发挥主要的联合国作用。我请你继续与该团合作。”

在1995年9月27日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中，阿富汗伊斯兰国指出：

“塔利班不仅破坏阿富汗西部的和平与安宁,而且同时也对阿富汗领土完整构成实际的外部威胁。”(S/1995/823,附件,第3页)

而且,

“为了迈向和平和创造适当环境以便和平转移权力给享有人民信任的一个当选的权力机构,最合理和实际的途径是,首先必须逐渐消除当前的‘信任危机’”。(同上)

1995年10月4日,我们在一般性辩论中宣布:

“破坏主张民主和人权的温和的伊斯兰制度的稳定的反动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打错了算盘。这些外国集团可能认为,塔利班篡权之后就一切对他们称心如意了。事实上,他们特别是由于把一个在阿富汗政局中从未真正出现过的派别带到这个局势中来,造成了另一问题。这些集团应该了解,首都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国家和该地区事实上的相对和平与稳定因在这一严重的错误估计而受到危害。1979年前苏联就犯过同样的错误。(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全体会议第19次会议,第8页)

就联合国特派团的活动而言,我们曾在1995年9月30日的一封信中建议,

“设立一个由各国,但不包括直接有关各方,及有关组织组成的阿富汗问题联系小组将有利于你(秘书长)和联合国阿富汗特派团团长马哈茂德·梅斯蒂里大使的努力。”(A/50/510,附件第2页)

我们曾在1995年10月12日的一封信中警告说,

“塔利班不同的领导人曾经几次宣称,他们拒绝联合国特派团向他们建议接受停火的行动。他们也拒绝了同冲突的其他当事方进行和平会谈的建议”。(A/1995/866,附件第2页)

我们在1995年11月12日的一封信中通知秘书长,

“1995年11月11日,塔利班向喀布尔的平民住区发射了多达170枚火箭,造成37个无辜者死亡,52名以上的平民受伤,并对公共财产造成巨大破坏”。(A/50/748,附件第2页)

因此,在1995年11月16日给秘书长的一封信(A/50/760)中,阿富汗伊斯兰国询问塔利班的真象、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他们拒绝和平进程和对联合国的否定态度。

由于塔利班1995年11月26日对首都猛烈轰炸,秘书长对战斗升级表示关切,并且呼吁各方同当时由马哈茂德·梅斯蒂里大使领导的联合国特派团的工作合作,争取立即实现停火,促进各方之间就权力转让的过渡机制进行谈判,实现一个所有阿富汗人都能接受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1996年期间,阿富汗继续在1996年1月19日的一封信(S/1996/44)中,把塔利班的暴行告诉联合国。

1996年4月9日,安全理事会就阿富汗问题召开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阿富汗伊斯兰国代表团就所谓的塔利班在阿富汗造成动乱和威胁本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提供了充分的情报。这一点在安全理事会1995年12月13日给报界的一份声明中得到承认。

1996年8月22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安全理事会成员

“强烈认为,交战各方应放弃使用武力,并通过谈判,用和平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安全理事会成员深信,谋求政治解决冲突的主要责任在于当事各方,而且所有国家都不应干涉。”(S/1996/683,第1和第2段)

塔利班一贯采取拒绝的态度,并且在行动上仍然反对所有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的文字与精神。

鉴于上述情况,我必须说,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看:谁应该对阿富汗境内还在发生的人类悲剧负责。难道不正是本组织对塔利班的顽固态度缺乏任何适当反应,鼓励并

使他们能够看到地洞是敞开的，并执行外国军工老板拟订的计谋？

阿富汗伊斯兰国就可能的后果不断警告联合国。责任在谁的身上？我们能否把它看作是一场袖手旁观的阴谋，或是一场害人的阴谋？不管是那一种，阿富汗人已经流了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迄今证明了一点，即阿富汗人的血不是廉价的，而不一文不值。

让我们回顾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所发生的急剧事件。政府部队撤离首都，以避免大流血。塔利班于1996年9月27日上午入侵喀布尔。政府当局把总部和办事处重新设在北部省份塔卡尔首府塔洛坎。

对塔利班的抵抗不仅仅限于喷赤河谷，塔利班正在那里展开广泛和紧张的战斗，以平民地区为目标。在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其他许多地区，也存在抵抗的潜力。不久我们就将听到起义的消息。

在今天的状况下，阿富汗伊斯兰国的目标没有变，而且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对1995年12月19日以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大会第50/88号决议的坚定承诺。

冲突中一方的暂时挫折和一方攫取了领土，不能意味着这一国家将实现和平。军事占领不会带来冲突的解决。恰恰相反，因为紧张的升级，再次有必要通过1995年12月19日第50/8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中规定的机制，谈判解决冲突。它为通过联合国和平进程解决阿富汗危机提供了办法。

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在1996年10月5日的《洛杉矶时报》上这样表示了他的关注：

“今后就是这样的政府，这令人可怕，因为这些人除了打仗外，什么经验都没有。”

在跨国界的军事援助下，侵入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将不会保证阿富汗的民族团结，尤其是鉴于它们对首都实行军事统治的头几天的所作所为。尽管塔利班属于普什图族，但他们既与阿富汗多数普什图族人意见不同，也与塔

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土库曼族、俾路支族、努里斯坦族和其他民族意见不一致。

阿富汗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学者不同意塔利班的压迫和落后的思想。阿富汗的许多宗教领导人不同意他们的立场，认为它是与当今世界穆斯林的需要相抵触的。他们都认为这些人是不能为人们接受的外国干预的工具。

不能把塔利班的军事统治看作是最终结果或既成事实。那些给塔利班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的外国势力不可能永久给他们的统治提供支助和经费。

塔利班对阿富汗的经济和社会复苏目标没有任何远见或能力。他们对今天阿富汗的众多需求缺乏一致和系统的思考或预测。他们许多领导人认为，当代科技的学说与宗教背道而驰。他们认为科学亵渎神圣。塔利班人认为地球是平的，他们不是阿富汗所需的人，在我们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时，阿富汗不需要他们。

然而，塔利班的外部支持者正企图掩盖他们的实际身份和性质，从而给这个非法、蒙昧主义和恐怖主义集团罩上合法的外衣。与塔利班建立任何关系都可能被他们视作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容忍。让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对联合国原则的冒犯，对恐怖主义的认可，是使外国干预合法化，甚至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

我以阿富汗伊斯兰国和受害的阿富汗民族的名义感谢所有那些表示关切和不同意塔利班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其对该城市实行恐怖统治的所有国家。

在喀布尔被占领几天后，即1996年10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举行了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协调会议。我荣幸地在会议上发了言。各位外长在最后公报中表示

“希望阿富汗各方将和平解决他们的政治分歧，为恢复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而共同努力”。

按照1995年12月19日大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50/88 B号决议，阿富汗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需要包括下列要素：第一，立即停止武装冲突，宣布停火；第二，促请阿富

汗所有各方在联合国的主持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下进行谈判；第三，就一个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的组成和设立及建立一个可靠和有权威的机构达成协议，并立即把权力移交给该机构；第四，巩固政治进程，以了解人们的意见，通过选举或举行传统的大国民议会会议解决问题。

我们的基本意见和主要目标如下：在民主价值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重建和平与稳定，建立有利于确保阿富汗人民能够在一种法律和秩序的气氛中生活的条件，这是对崇高的伊斯兰原则真正和忠实理想的要求；在能够调动群众，确保实现这些目标的阿富汗所有各方之间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将使阿富汗再次成为促进它所在区域和平与稳定的一个积极因素。

只有一个民族团结过渡政府才能够确保阿富汗的民族团结，使阿富汗的重建和复苏这项重大任务得以开始实施。没有阿富汗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专家和技术专业人员的充分参与，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他们中许多人现在仍生活在国外。我们期待支持阿富汗和平与稳定的所有国家帮助我国人民实现这些崇高目标。

五十一年前在旧金山市通过《联合国宪章》时，这个全球性组织的缔造者宣布联合国的基础是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当时这项原则只是一个理想。许多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和数百万人的牺牲以及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全球大家庭成员之间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证明了这项原则的正确性。

在这方面，应当引述法国外交部长埃尔韦·德沙雷特先生阁下9月25日在这个讲台上所说的话：

“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没有准则、没有价值观、没有参考依据的世界，只能任由那些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少数人自行决定这个星球的未来”。（《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第8次全体会议》，第15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干达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尊敬的埃利亚·卡拉加亚先生阁下发言。

卡拉加亚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和荣幸地在大会发言。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和分歧，在这个崇高的讲台上作为一个全球大家庭的成员彼此对话。联合国今天是人类实现更美好未来的最好希望。因此，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必定积极和有效的推动实现《联合国宪章》阐明的崇高宗旨和原则。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乌干达代表团表示，我们对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你受之无愧地当选是你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巨大荣誉。乌干达与马来西亚有着非常友好的双边关系。主席先生，我要保证我们将向你提供充分的支持，并声明我们深信你有能力指导我们的审议取得圆满成功。还请允许我对你的前任、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主持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工作的干练方式表示特别的赞扬。

我赞扬我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过去五年里对联合国全球使命的投入和奉献。

联合国仍面临着纠正各国之间、尤其是极少数富国与大多数穷国之间发展差距的挑战。对后者而言，这些差距表现为广泛的贫困以及它们生态系统的恶化。这也是暴力和内部冲突升级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带来痛苦与破坏。

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这些问题具有区域和全球影响。因此，把它们当作仅是受影响国家和区域的问题来对待是一厢情愿的。必须通过全球的办法和战略来处理，以确保持久的解决办法。

我们注意到，目前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造成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开放和全球化在各国间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种双重现象还加深了一些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边缘化。这一进程会在国家间产生进一步两极化，带来急剧破坏性和不稳定的后果。我们谨强调多边组织和国际合作的持续意义，它们是公平全球增长和发展以及处理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前提。

国际贸易中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和冲突的日益明显趋势，引起我们严重关切。我们所看到的局势是：发展中国



家被迫打开其市场,表面上看是推动自由贸易和竞争,然而同时发达国家却实行控制贸易并限制发展中国家某些出口产品的进入。这一矛盾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不健康的。

世界贸易组织于1994年成立,成为担任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监护者和保障者的实体,这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因此,我们欢迎于1996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世界贸易组织第一次部长级会议。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应就纠正目前多边贸易体系中存在不平衡现象的措施而为世贸组织在今后两年中指出明确的政策的方向,而这种不平衡现象不利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因此,这次会议应高度优先考虑对乌拉圭回合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审查,以采取特别和具体措施来避免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由于执行这些协定而产生的食品净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扭转最不发达国家的边缘化现象,并加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必须包括长期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以及转让,这是有效执行乌拉圭协定以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的关键因素。

对于这次会议应处理世贸组织内部议程之外的问题的建议,我们希望首先受益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关于这一问题对国际贸易的政策影响的建议,然后再由世贸组织予以审议。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应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充分履行已商定的承诺,例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技术支持,以及旨在制止和扭转对贸易的不实因素。

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货物与服务方面以及在私有资本流通方面的日益明显的作用,过渡加强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资源和技术转让以及专业技术的控制。在一些情况中,这种控制已超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制约能力。鉴于这些公司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而增长,急需制订并采取一套有效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行为准则,以管制跨国公司的活动与影响。

副主席特奎斯特先生(巴哈马)主持会议。

我们致力于次区域和区域合作一体化。我们在东非次区域积极参与振兴东非合作组织,加强东非和南部非洲共同体,并加紧努力使确立非洲经济的《阿布贾条约》发

挥作用。我们认为,经过加强的次区域和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是辅助南南合作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关键。它还是提高竞争力从而改进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表现的手段。在进一步加强东非合作的努力中,我们提议在东非共同体与联合国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安排。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种努力。

债务的严重程度及其还本付息的义务继续对我们的发展努力构成严重障碍。例如截至1996年3月,乌干达的外债总额为32亿美元,这意味着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7.5%,其中75%是欠多边金融机构的。债务还本付息为1亿4千1百万美元,或者说是出口收入的27%。预测1996—1997财政年的债务还本付息为1亿8千4百万美元,或为出口收入的35.8%。多边金融机构债权人目前所推行的严厉的债务偿还执行体制使这种危险局势更为复杂。

乌干达致力于在其有限能力范围内履行其债务义务。在这方面,已成立了一个多边债务基金,以抵消欠国际发展协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发展银行的非洲发展基金的债务。我们感谢继续支持该基金并对其直接捐款的所有双边捐助国。我们还呼吁其他捐助国参与这一重要的努力,以扩大该基金仍十分低的资金水平。

为了补充这种努力,我们特别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多边金融机构采取集体措施,以大幅度削减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负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象《那不勒斯条款》这样目前实行的第一步减缓债务行动。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对产生任何有益影响来说仍严重不足。因此,要予以扩大就需要采取大幅度降低各种债务的更多的措施,包括可以形成免除债务或把我们的部分或全部债务变为赠款的措施。

我们赞许地注意到布雷顿森林体制目前采取的实行债务减免的措施。我们敦促主要股东支持这些措施。

包括乌干达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受到出口商品创记录的低水平收益的不利影响。我们的贸易伙伴对我们半加工和加工出口产品实行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由于进口制成品和劳务的价格增长而日益恶化的贸易的条件,使这一局势更形严重。我们敦促采取具体辅助措施,以改

进我们的出口收益,这可以包括在我们各国经济的横向和纵向多样化以及扩大能力方面提供援助。

今天是世界生境日。今天是国际社会对世界各地10亿人的苦难进行反思和重申其承诺的日子,这些人缺少足够助手和基本服务,如安全供水和卫生设备等。今天也是我们献身于以下目标的日子:为无家可归者的各种问题和同迅速城市化有关的其他社会弊病找到持久解决办法。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对联合国仍然是巨大的挑战。在这方面的努力继续受到冲突和紧张局势的破坏,而冲突和紧张局势则是由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受影响地区的种族、宗教和社会分歧的不得力的政治领导造成的。这些冲突和紧张局势破坏了法治、和平与安全,并造成了受影响国家中许多国家的无穷苦难。

在非洲,内部纷争和国内冲突以及伴随而来的后果正在不同程度上使好几个国家受害。例如,我们严重关切叛乱团伙强加给乌干达北部人民的苦难。为了我们次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必须立即停止这些恐怖主义行径。

布隆迪的冲突是对该国以及次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乌干达呼吁所有各当事方接受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调停努力,这些努力的目的是通过在阿鲁沙倡议和和平进程范围内的妥协和让步实现冲突的和平政治解决。

在这方面,乌干达敦促所有各当事方作为紧急事项恢复无条件政治谈判,以便为全体布隆迪人民建立和平与安全。我们承诺同次区域其他各国紧密合作,通过对话和民族和解寻求对布隆迪问题的持久政治解决。卢旺达政府为恢复正常化和实现民族和解所采取的步骤是朝着正确方向的步骤。这些步骤应受到鼓励和支持,因为它们为恢复相互信任提供了基础,这对卢旺达难民从邻国和平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是关键的。

我们对索马里的混乱局势表示关切,并呼吁使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和平努力重新恢复活力。

利比里亚交战各派系必须根据常理行事,以使这个不幸国家的人民可能得到享有和平、安全与民族和解的机会。我们欢迎西非经济共同体在这方面的努力。

关于安哥拉,我们注意到《卢萨卡议定书》正在得到执行。我们鼓励双方坚持走这条道路。

为谋求塞拉利昂冲突的和平解决,非统组织的努力以及科特迪瓦贝迪总统的亚穆克罗调停努力都应得到鼓励。

乌干达支持萨拉威人民争取自决的正义斗争。为此目的,我们敦促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迅速解决西撒哈拉冲突。

乌干达支持联合国和适当的区域组织通过预防性外交并通过维持和平与建立和平的各种机制,包括对话和建立信任,化解冲突。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支持非统组织预防、处置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及其中央机关。应该支持这个机制和中央机关,并对它们提供必须资源使之能有效运作。

鼓励非洲成员国作好应变安排以便当非洲出现需要维持和平特派团或军事观察团时进行部署,这种想法有其长处,理应受到支持。与此同时,具有内在机制的人道主义方案对恢复持久和平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内在机制处理从紧急救济到复兴、恢复和长期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欢迎通过《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但是,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把握这个机会,致力于为全面根除所有核武器规定具体时限并停止核武器库质量上的发展和改进,包括通过计算机模拟。

大多数非洲国家支持和正在大力推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在乌干达,我们已执行同我国发展优先事项和对策相一致的根本性经济改革以及布雷顿森林机制的结构调整方案。我们已经使贸易自由化,并创造了必要条件鼓励和促进国内和国外直接投资。我们已改进了我们的经济管理制度,大力强调财政和货币纪律。我们努力执行重大国际会议的成果并将其纳入我们国家发展计划和优先事项中。

但是,为了扶植这些积极事态发展和改善我国公民的福利,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一致合作和支持,确保,除其他外,一个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

我高兴地说,乌干达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复兴的国家。让我简单概述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造成了乌干达今天的和平、安全和其他积极变化。这些积极变化是和解政策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和解本身是实现一个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国家团结。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从一开始就组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它包容各种色彩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民主化进程的支柱是全国在政治上参与所有各个级别的决策,这授权人民掌官对自己的治理。

乌干达仍致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权。已经设立了一个人权委员会以监督乌干达对人权的遵守情况。同这个委员会互为补充的是司法部内的一个全国人权股,在最近的将来在区的一级也将设立类似的股。我们已确保对人权的促进包括解决机会不平等的这个组成部分,这是通过有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妇女、青年和残疾人——的明确行动进行的。

在这方面,1995年乌干达宪法规定这些群体在议会会有特别的代表权。我们欣赏迄今对我们在这一领域所提供的支持,并欢迎进一步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尤其是用于适当立法的审议和最后定案以及加强各级有关的人权实体。

去年,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的制宪议会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辩论之后颁布了一部新宪法。1996年5月9日,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和公正的总统选举,随后在1996年6月27日进行了议会选举。今天乌干达有了它自1962年独立以来第一次直接选的总统。

在乌干达,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即权力分散是良政和授权的必要条件,因为除非给予文明社会运作的空间,否则民主不能繁荣。为实行这点,政治权力分散不仅庄严载入宪法之中,而且也正在执行之中。将权力这样转到各区和其他更低的级别消除了政府的遥不可及,并确保对人民更快地兑现诺言和服务。

多年的战争和经济管理不善造成了乌干达支离破碎的经济。目前的行政当局在经济改革方案框架内不断在恢复经济方面取得稳定进展。自1992年6月以来,成功地将通货膨胀平均控制在5.6%的水平上。与此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稳定和严格的货币政策,乌干达的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8.1%。

副主席波斯特韦克女士(巴哈马)主持会议。

为了吸引投资,我们制订了一部投资法,以确保一种友好、有利的投资环境。还成立了乌干达投资管理局,作为提供信息的一站式中心。

乌干达赞赏联合国为消灭贫穷采取的许多倡议。应该特别提到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和《联合国全系统非洲特别倡议》。我们赞赏这种旨在解决我们区域持续的贫困的国际伙伴精神。乌干达政府已经踏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漫长道路,以保证使人民大众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正在执行的战略包括一个《消灭贫困行动计划》,并成立了一个除贫工作队,作为上述计划的执行机构。《行动计划》的短期和中期工作重点是提高家庭收入、初级教育和道路基础设施。迄今取得的政治和经济成就证明,一个认真、有远见和作出承诺的政府可以引导捐助国设立的条件,而不是受制于这些条件。

我们刚刚结束关于《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的执行情况的中期审查。这次会议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为此我们最深切地感谢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的日本政府和所有代表团。审查工作的根本结论之一是:在巩固非洲大陆某些地区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这就要求动员大量新的、追加的资源,特别是专门用于创造一种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的资源。审查还表明,一种基本共同的责任和共同的利益的伙伴合作关系是有可能建立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联合国仍然是诸如民主施政第一等许多宝贵理想的维护者。联合国诞生于一种渴望,即希望建立一种有能力解决世界各地的可怕的紧张局势和冲突造成的问题的民

主多边体制,以使这个行星成为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更安全、公正和友好的地方。我们一致认为有必须加强联合国,以使它有效地执行其的全球使命。因此,我们应该给它提供足够的资源。而这种承诺总是要求每一个会员国全额、按时和无条件地履行对本组织承担的财政义务。

为了加强本组织,应该采取措施实现它在各个级别上的民主化。鉴于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本组织对这些改革之风再也不能不为所动了。因此,乌干达支持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以使其工作方法具有透明度,决策程序变民主,并公平地反映出联合国已经增加的会员国数目。

我们认为,联合国仍然是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适宜的中心论坛。必须加强和振兴联合国,并使它民主化。这是联合国人民必须优先对付的挑战。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外交、旅游和新闻部队阿尔皮安·艾伦阁下发言。

艾伦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去年,我们在吹奏和赞美声中纪念了联合国五十周年。我们仔细地适当地审查了本组织的各个机构,而得到的结论是令人鼓舞的。目前盛行的观点是:本组织的力量远超过它的弱点。然而,我们不能自满。我国总理詹姆斯·米切尔爵士在向第五十届会议讲话时说道:

“有生命的机构就象任何生命那样需要新鲜的养料和新的思想的培养。有生命的事物不改善就会消亡。”(大会正式记录,第50届会议,全体会议,第40次会议,第43页)。

拉扎利先生在进行了总结并在我们以新的信心看待联合国的时候担任了主席,他对创新的热情会对他很有用。在他主持这个重新焕发活力的机构时,我要祝贺他当选为主席。让我借此机会向他的前任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和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上届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21世纪临近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未来如何?我们的孩子们能生存下去吗?我们能同他人和平相处吗?

我们看到的景象是暗淡的。持续的贫困、疾病、饥饿、环境退化和精神污染、蛮横的恐怖主义行径、毒品的威胁、内部动乱和区域冲突仍然在困扰着我们。

但只要我们把彼此视为朋友和邻人,而不是对手,那就仍然有希望。如果我们集中资源用于促进人类的进步,世界就将是一个美好得多的地方。

去年,我们目睹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毁灭和死亡。我们认为,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懦夫,他们实现其邪恶的目的靠的是制造恐惧和破坏稳定。靠谋杀和伤害无辜的人们算是什么胜利?这显然是疯子们的作为。国际社会容不得这些不露面的罪犯的这些行径——有时还得到当局的默许。

我国代表团呼吁为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召开另一次会议。这种会议必须有这一整个机构参加,以使小国和大国就此问题发表意见。在新的世纪临近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必须能够在公园里自由地游玩,而用不着提防周围。当我们旅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能够把我们身边同行的旅客视作新结识的朋友,而不是可能杀人的刽子手。

为什么我们还继续储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些武器的目的是屠杀。不应该把杀人作为一种消遣。在人类拥有的一切中生命永远是最宝贵的。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区域,我们和这个有致命武库的世界格格不入,并将继续谴责使用这些武库。我们高兴地支持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澳大利亚决议。朝着限制军备竞赛和最终消除武器迈出的任何一步,无论多么微小,都必须被视为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时代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是保护环境。我们面临的威胁令人生畏,全球变暖、荒漠化和毁坏森林是许多威胁中的一些。环境保护是我们生存的关键。人类面临一个选择:或是拯救环境,或是死亡。

不能不注意布隆迪、索马里、利比里亚、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苦难。国际社会可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帮助这些动乱地区受驱逐和挨饿的人们。归根结底,我们不应该是我们兄弟的看护人吗?

我来自一个虽小但感到自豪的国家。我国人民主张勤奋和努力工作。香蕉业是我国经济的主权支柱。但我们的生存受到比我们自己更大和更强有力的势力的威胁。我这样说时并不是感到愤怒,而是感到痛苦和无助。在那些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人却试图摧毁我们时,我们还能有别的感觉吗?如果漠不关心和贪婪的势力能够得逞,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不正常,我们如此珍视的民主将被付之一炬。

我们全体人民都对我们香蕉的敌人变得敏感,人们向可能掌握我们生存之匙的人写了成千上万封信,发泄他们的沮丧。我们谨感谢所有给予我们援助的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其他地方。我们并真诚地希望他们将伸出援助之手。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对使用非法毒品和毒品泛滥深感关切。这个问题的规模已跨越了国家边界,需要在多边一级加强合作。毒品大王们的影响极深。有时候他们具有上层权势人物的特点。我们坚信,再次作出国际努力将十分有助于铲除这种污染身体和精神的威胁。

我们对波斯尼亚最近的选举表示欢迎,同时又对波斯湾的事态发展感到不安。我们真诚地希望局势能够尽快正常化,因为危机升级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中东是使人感到关切的另一个地区。我们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近举行的和平谈判将结出硕果。过去20年中已取得了许多成就,人民期望,下一个世纪将为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灾多难的人民带来和平。

我现在谈一谈台湾的中华民国重新加入联合国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四分之一世纪来这个联合国的创始国一直被排除在本机构外。人们怎么能够使这个事实与国家平行代表制和普遍性原则相一致?现在是把台湾的中华民国重新接纳入这个机构的时候了。我们认为,该国不仅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特点,并完全有能力对本机构会员国的发展作出贡献。它的经济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典范。该国还在民主方面迈出大步。我谨通过这个论坛对台湾的中华民国举行了第一次直接总统选举表示祝贺。这确实是民主进程的一个胜利。并非所有国家都采纳这一进程。

尽管《儿童权利公约》已获得通过并生效,我们对发生严重侵犯儿童基本权利的事件感到震惊。性虐待、卖淫和童工只是我们的儿童遭到非人待遇的各种问题中的一些。我国代表团加入这样的呼吁,即不仅为了普遍批准该公约、并且为了有效地执行这项文书采取各种措施。

对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已讨论了很多。各方面提出了精彩的意见。我们自己的观点是,必须改组安全理事会,以反映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大国毕竟不能垄断知识或事实。在这个机构里所有国家都应受到平等待遇。

历史使联合国负有责任的重担,在我们展望二十一世纪时,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实现《宪章》庄严载明的各项目标和理想。在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一旦我们有了政治意愿和共同的目标我们就能去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冈比亚工程、通讯和新闻部长埃布里马·塞萨伊先生阁下发言。

塞萨伊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衷心祝贺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担任本届会议主席。他这些年中作为其国家代表与联合国的密切联系使他不仅极其胜任这一职务,而且完全了解我们这个伟大组织的各项活动,包括它的需要和挑战。我想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自始至终的支持。

同样的,我想对他的前任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为确保大会工作的效力和成功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我国代表团也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严重的财政及其它压力面前成功地举行了本届会议,对他无私地为本组织服务表示感谢和感激。他的工作质量和他为重振我们五十高龄的组织的不懈努力应该得到我们全力和集体的支持和鼓励。冈比亚仍坚决同意非洲统一组织宣布支持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续任第二期秘书长职务。

去年,冈比亚代表团在大会发言时,我们详细地谈到冈比亚民主化和发展这两个相关的进程。今天不妨报告一下迄今为止取得的进步和获得的成就。我很荣幸告诉

大会,我们于1996年8月8日成功地举行了公民投票,通过一部新宪法,而且,我们于1996年9月26日选举了新总统。这两项活动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成熟感和公民兴趣感,以及高程度地选民出动率。

宪法以270 093票赞成、113 744票反对获得通过。公民投票总出动率为86.9%。这个新宪法不仅是我们有过的宪法中最好的,而且它包容了人民对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和公平的所抱的政治期望,以及其对和平的热爱、对人权的尊重和一种强烈的基于愿在自由和公平的基础上与世界其它国家相联系的民族感情。此外,新宪法保证第二共和国将在普遍尊重的原则下进步、繁荣——这些原则是透明度、说明问题的责任和正直感——这是任何诚实和善意的政府所需的一个必要条件。总统选举是我国两年计划的倒数第二阶段,在1996年9月26日举行。四个政党党派推出了候选人,爱国调整和建设同盟(调整建设同盟)领导人叶海亚·A. J. J. 雅麦阁下成为胜利者。当选总统得票220 011票,或相当于总票数的56%。这个巨大胜利表示冈比亚人民强烈赞成现在已解散的武装部队临时执政委员会(武装执政委员会)的政策。结果的分布和各个候选人获得的实际票数的百分比说明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没有明显滥用现任职务。

当选总统遵守武装执政委员会的民族统一方针,向所有冈比亚人发出了和平与和解的信息。在总统选举后1996年9月27日向全国的讲话中,他说:

“在民主选举中没有失败的选民,因为结果是大家的集体意志。”

他请所有冈比亚人,无论政治信仰或派别,团结起来,为国家的发展而奋斗。在完成该民主化进程时,冈比亚将于1996年12月11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政府和临时独立选举委员会都十分重视这些选举,因此一直鼓励有兴趣的派别和个人竞争国民议会的席位。我们毫不怀疑作为公民投票和总统选举特点的和平与井然有序将会遍行于即将来临的选举。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优先发展项目补充了冈比亚的选举进程。在过去两年中,政府向全世界表明国家发展的

一个重要成分是政府为人民利益执行现实的计划中的承诺和诚实。在教育方面,建立了几所小学、初中和高中,并开始了一个大学附属专业。在通讯领域,全国的第一座电视台已经交付使用;国际机场进行了扩大和现代化。总体上,全国的公路网作了重大的更新和扩建,以缓解长期的运输问题。在保健方面,政府建立了第三所复诊医院,从国内外招聘了更多的医生和护士。至于农业方面,更加注重机械化,作为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第一步。简言之,在武装执政委员会执政的两年期间在经济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前政权在30年间的更多。

过去两年中冈比亚经济的复原力令人感到宽慰——尽管我国的发展伙伴出于纯粹政治原因对冈比亚强行不合理的制裁,尽管有其他主要来自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趋势的强大外部冲击。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努力帮助建立了一种使私人投资成为可能的环境,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本国1995-96年度的经济和财政效益显示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对1996-97年度的预测是增长3.5%,而通货膨胀则限制在5%。

在我们向前迈进的过程中,我们就为冈比亚政府和它自1994年7月22日掌握政权以来的值得称颂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们认识了民主的真谛:人民和政府之间保持真诚的伙伴关系。正是通过这种伙伴关系,公民教育方案获得了成功,而且开始执行一项旨在提高冈比亚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2020年的理想。

我愿在此代表冈比亚政府和人民向国际社会在此过渡方案的关键时期所提供的支持和援助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们热切希望我们的友人和怀有友好愿望的人的这种支持将继续使我们成功地举行即将于1996年12月11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由于顺利完成了两年期的过渡方案以及由于我国和平地回到民主的非军人统治,我们还希望国际社会现在和我们一起共同谋求可持续的发展。

最近在伊斯坦布尔闭幕的联合国人类住区问题会议(生境二)将作为联合国组织最成功的国际会议之一载入史册。会议通过的生境议程一般反映了极度缺少住房以及国际对更多更好住房的关切日益增长。在这个逐渐城市化的世界中,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住房和可持续的人类

住区发展仍然是基本人类的需要和普遍关切的问题。事实上,生境二的秘书长沃利·恩道先生说:

“伊斯坦布尔将成为进入下一个世纪时通向发展的门户”,

他的说法直到进入21世纪之后很久都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冈比亚政府对执行生境议程——包括其全球行动计划以及特别是和人类住区领域中所有执行者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的承诺。

1996年9月进行的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中期审议提供了审议非洲发展的机会。这项审议重申,如果非洲及其发展伙伴坚持方案所陈述的责任和承诺,那么新议程就是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而可实现的方案。审议揭示了非洲经济逐步但令人鼓舞的增长情况,1995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至2.3%,而1994年为2.1%。然而,由于没有达到联合国关于将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0.7%,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0.15%,作为海外发展援助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指标,新议程的执行仍然是受到限制的。

在1990到1995年间,非洲沉重的外债负担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5%,仍然是非洲连续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严重的制约。主要捐款国,债权国和国际社会应当集体设计一种多边减免债务的方案,以便在下个世纪初完全抵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新议程一起执行联合国全系统非洲特别倡议,以及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其他机构共同合作,将构成与非洲共同努力加速其发展的新的全球方法。是否能在十年内达到特别倡议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新的更多的基金,而不是重新安排方案的优先顺序和重新安排新议程指定的基金。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能认识到,正如世界银行的主席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在谈到开展特别倡议时所说的:

“我们有必要给予足以保持势头的推动、帮助、援助”。

全球化继续是十分诱人的,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从中获益。全球化和就业自由化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消极的。最近在南非召开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九届会议,重申了国际社会对发展的伙伴关系的承诺、承认了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有必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得到全球化和发展的益处,并承认有必要保证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有效地参与世界经济。

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一直得到国际社会的注视和支持——尤其是以通过1990年代的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巴黎宣言和行动计划。1995年9月对这一行动方案的审议没有能够肯定方案实现了其主要目标,既: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制止和扭转社会经济恶化的局势并向它们的增长和发展给予新的活力。我们注意到,改善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效益进展甚微,主要是归因于国际社会没有能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减免债务和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得益等方式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行动方案下半期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支持。

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仍然是联合国工作的重要方面。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和国际社会一起支持联合国为确保和平以及解决世界各地冲突的努力。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对1996年4月利比里亚动乱对和平进程的挫伤十分关切。然而,由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的不断努力,特别是通过其利比里亚问题九人委员会的努力,和平进程回到了正轨,并且迄今在执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尽管近几年在执行《阿布贾协定》中遇到了困难,我们仍然相信《阿布贾协定》是恢复利比里亚持久和平的最好的框架。由于各方具有真正的承诺和良好的愿望,以及由于国际社会的不断支持,特别是联合国的支持,我相信很快会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法。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出现了经撮合的和平能够维持的一线希望。1996年9月14日的选举以及新产生的联邦政府应该有希望导致民族团结与和解。

看到索马里的内战在平息了一段时间后又突然爆发,使人感到难过。重新开战对和平进程造成了很大压力。非洲统一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总的来说,遏制了敌对行动,恢复了和平、安全和稳定,对此我们仍然全力支持。

布隆迪急剧恶化的局势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严重关注的问题。该国种族杀戮突然爆发，夺去了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使我们的确感到痛心。制止这种令人遗憾的状态，从而防止两年以前在邻国卢旺达发生的悲惨事件重演，是我们的集体责任。在这方面，我们继续密切注视着布隆迪政治局势的演变，并希望和平、安全和秩序能永远恢复。因此我们强烈支持非统组织的和平倡议，特别是旨在保证布隆迪所有人民安全和民主的姆万扎和平进程和阿鲁沙和平倡议。

我们在谋求中东持久和平中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收获不应该逐渐消失。相反，我们应当继续遵循和平进程以便在安理会决议基础上实现该区域的持久和平。

谋求和平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同时，一些国家继续无法实现平等和得到承认的愿望。中华民国在台湾要求得到承认和重新加入联合国的要求未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诚意产生必要影响。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在国际领域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很高的地位，不仅其经济成就，而且其出色的政治改革使它引人注目。其总统在1996年3月23日直接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事件，标志着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顶点。联合国也应该按照普遍性原则承认这一成就。我国认为，曾适用于前东德和西德并且目前适用于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平行联合国会员的先例应该适用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情况。

除了符合《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的成员因素之外，还有关系到《宪章》第一和第二条款的公正因素。令人遗憾的是，大会总务委员会1996年9月18日举行的关于题为“审议大会第2758(XXVI)号决议导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二千一百三十万人民无法参加联合国活动的特殊情况”的议程草案项目的会议审查该事项时，这一因素没有包括在我们的辩论中。众所周知，可以量化签字数字，却不能量化感情——即对台湾情况的正当性和正确性的同情、兴趣和相信。我们坚信，台湾海峡两岸平行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将有助于在亚太区域和整个世界维持和平与安全。因此让我们给中华民国在台湾机会来和我们分享集体努力实现人类平等发展世界各区域的希望的能力和经验。

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单方面实施经济禁运的作法在冷战结束时便应该停止了。30多年来，古巴艰苦奋斗以求经济和财政生存。古巴以耐心和决心继续取得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进展。的确在国际大家庭中，古巴在给人类带来共同利益的一些活动，如遗传工程和现代医药方面表现突出。古巴取得的这些令人称赞的成就和进步应该得到鼓励。

国际法原则的适用和国际社会扩展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应该包括各国。在这方面，关于利比亚被指控涉嫌泛美103号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坠毁，我们支持部长理事会在1996年7月1日至5日在雅温得举行的第六十四届会议所通过的非统组织决议作为克服该问题目前僵局的基础。

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我们愿促请国际社会不放松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寻求公正与和平解决该争端的努力。冈比亚再次确认致力于国际社会打击赤裸裸的侵略，尤其是国家间侵略和无论来自何方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遵循安全理事会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有关决议，我们支持科威特努力维护和保卫领土完整，同时谋求公平和迅速纠正伊拉克入侵的后果。

去年我们庆祝了联合国五十周年。那个场合给了我们审查联合国业务活动和授权的机会。正在进行中的加强联合国系统的努力辅助这一审议工作和进一步致力于联合国的理想。特别是，我们完全支持重振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包括所有地理区域在这个联合国重要机构具有公平代表权的问题。除其他外，非洲集团和意大利提出的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也应得到适当审议。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应确保不促进少数的霸权利益而损害大多数国家。

联合国的改革使人们高度注意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和秘书长改善财政状况的英勇努力。大会自1994年以来对该事项的认真审议导致设立一个联合国财政状况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高级别工作组，这再次表明会员国承诺保持联合国并使其继续运作。财政改革，包括大批裁减人员的渐增效果应尽可能既不损害联合国的效率和成效，也不使它偏离传统业务活动和更新的任务。联合国危险的财



政状况是我们的集体关切,我们因此应该坚决努力以确保该状况得到立即纠正。这当然要求所有会员国具有按时缴纳会费的明确政治意愿。各会员国不要因纯属政治考虑而拒付会费,因为这样将使联合国的运作瘫痪。

现在应该提及本组织谋求实现《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目标的工作。寻求解决冲突、救济活动和发展的国际合作的共同基础仍是联合国的积极议程。国际合作在这些问题上的成功将要求更集中注意有效执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优先事项。和平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联合国宪章》的组成部分。这两者是国际社会努力实现基于促进各国人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普遍和平与安全的两个支柱。我们继续充分致力于它们的有效实现。

非法药物贩运和滥用的多方面问题日益普遍。在许多方面,生产国和非生产国都迅速成为非法药物有害作用的受害者。一度无毒品的国家现在或者逐渐到处销售和非法使用药品,或者成为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中转站。多年来,联合国特别通过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全球行动纲领》,并最近通过把毒品作为1996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会议的议题来领导对全球毒品威胁的坚定和包容各方的斗争。联合国打击贩运和销售非法药物的努力要获得成功,国际社会就必须以药物管制方面更好的有效国际合作的方式提供全力支持。冈比亚将继续参加打击和消除全球毒品威胁的国际努力。在国家一级,已经建立适当机制并采取管制措施,以阻止用冈比亚作为全球非法毒品交易的中转站,并防止冈比亚人成为其有害作用的受害者。

在核裁军领域,人们欣慰地注意到,大会最近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国际社会的这种核可不应忽视印度表达的合理关切和保留。

为了处理饥饿和粮食保障问题,下个月将罗马召开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这为国际社会重新致力于根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并致力于实现人人均有粮食保障提供了机会。

粮食保障问题与贫穷之间的联系应极力强调。冈比亚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框架内和在纪念消灭贫穷国际年

(1996年)的同时,有效地参加了消灭贫穷的斗争。为实现消灭贫穷还制定并实施了各项国家方案。

20世纪最后十年出现了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合作活动。一系列联合国全球会议意味着国际社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和维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宣传发展技术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住房,以至对努力确保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都十分关心。

冈比亚自豪地参加了这场争取人人均享安全和更好生活的国际努力。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团团长,我现在请他发言。

刘易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向主席致敬,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并具有高度水平的外交官,会无愧地主持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工作。我忆及,正是他的国家和我国把南极洲问题提交到联合国,我们两个国家若干年来一直密切合作。我们取得了进展,因为世界各地国家都同我们一起努力维护南极洲这个人类最后的自然遗产。我国国民对他的国家在改善国际社会方面所作的努力深表敬佩,我们真诚地把马来西亚当作一个友好兄弟国家。还请允许我向卸任主席、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表示衷心感谢,他非常干练地领导了历史性大会第五十届会议。

今年7月7日,伯莎号飓风在十分危险地靠近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地方一扫而过,我国姊妹岛受到一些损害。象我们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易遭到各种自然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和飓风。1974年,我们经历了一场里氏7.8地震级并造成很大破坏。距我们海岸大约50公里的蒙特塞拉特岛上的一个火山过去15个月来一直十分活跃。我国人民一直生活在一场大喷发造成的坠尘和海啸的恐惧之中。

目前困扰蒙特塞拉特的自然现象可能是一场能摧毁全球小岛屿的灾难的前奏。地球变暖的证据显然已经出现,极恶劣的天气更加经常、更加密集地出现。去年,路

易斯号飓风猛烈地袭击了我国48小时，这场飓风已被宣布为本世纪最严重的风暴。玛里琳号飓风接踵而来，使破坏更加严重。的确，我们仍然非常感谢各国和各机构为帮助重建而提供各种形式援助。

我国使节曾在今年美洲国家组织大会讲话时指出，如果每年都有几十场风暴和飓风袭卷我们区域，发展就不能持久。自从200年前西欧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一直燃烧石油、煤矿、木材和天然气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已开始危及小岛屿的生存。有害生产、挥霍性消费和危险处理模式仍是最大工业国家的行为特点。因此，我必须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商定的多伦多目标。让我们共同处理这个挑战，以便使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一个比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消亡只能意味着一个比以往任何文明都更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辉煌文明开始结束。

7月1日至15日，安提瓜和巴布达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上发挥了其作用，我们敦促严守《伊斯坦堡宣言》和《行动计划》。必须承认，我们大多数人最终都将生活和工作在新城市化世界的各城市和城镇中，人们正是在这些城市和城镇中从事大多数经济活动和生产物品的。大多数污染都将发生在那里，国家资源也将在那里消费，其影响将大大越过城市的界限。另外，以贫穷和资源分配不良为根源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和冲突也将在这个城市化世界的各城市和城镇中得到解决，并从中找到真正人类安全的钥匙。

城市化问题不仅局限于更富有的国家。我们尽管国土很小，但仍不得不对付需要作出回应的各种模式和结果，而我们有时可能对如何回应感到不知所措。但尽管如此，我高兴地向大家报告，我们安提瓜和巴布达已朝防止和充分管理的方向取得很大进展。

在开发管理局和中央住房和规划局指导下，在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助下，已经进行了若干重大努力。政府与社会其他部门合作，正在扮演多种角色，以合理地改进生活和工作条件，使所有公民都能得到适当住所、负担得起的基本服务以及可持续的人类住区。

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是国家决策者和住房管理者，而且也是借贷和开发者。通过扮演这些角色，政府保证将利息维持在合理水平，而且偿还款可长达20年。工党政府作为管理者提出了若干发展标准、规定了建筑程序，并将土地和住所政策与减少贫困、保障就业、保护环境、改进教育和保健、提供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等方案结合起来。

这确实是一个奇怪而令人费解的世界。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一个日益广泛流传的神话，这个神话就是发展中世界正在大步向前迈进。然而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开展发展援助活动的国家，在截至1994年的十年里，60%以上的国家人均收入下降。

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6年务实会议开幕式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协调员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发表了生动和强有力的演讲，他指出目前状况存在着两大讽刺。他宣告，世界既然已经摆脱了对发展合作所造成的扭曲性影响，正当发展援助界已经学到许多经验，知道如何取得成功以及做好工作之际，正当发展中世界的需要日益迅速和戏剧性地增长之际——正在这个时刻，促进发展合作所需要的资源却在迅速和戏剧性地减少。在过去四年里，发展援助实际金额下降了20%至25%。

另一讽刺是，正当人们更好地了解了和平与发展合作之间的重要联系时，正当人们要求联合国在各种会议后续行动方面、在冲突后建立和平和其他领域承担起更大责任时，正当联合国进行改革并加强自己以做好这些工作时，本组织却受到财政危机的威胁，这个危机既影响到分摊的捐款也影响到自愿捐款。事实上，斯佩思认为上述现象不仅仅是讽刺现象，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剧。

这个主要国际组织正在进行调整，并且努力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改革。虽然可以说现在的财务危机主要是支付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浪费，例如工作细节重复、过多地影印文件、安排注定不产生任何结果的许多会议、以及许多其他不应该开展的活动。然而，财务问题并不是这个世界机构处理的唯一问题。目前正在从多方面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个长时间的进程，只有以边沁主义的做法，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能支持这种进程。

目前,虽然大家认为在讨论方面已取得某些进展,但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及有关事项”方面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结果。虽然在扩大安理会方面已经存在着协商一致意见,但以何种方式才能公平地扩大安理会,仍是尚未解决的问题。安提瓜和巴布达坚定地认为,以任何形式扩大安理会都必须包括发展中国家,非洲集团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集团都应有代表席位。同样地,安提瓜和巴布达希望对否决权的行使设置某些限制。然而,我们了解,调整和改革联合国的一切努力应该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为重点。

在整个误解过程中,各区域委员会正受到攻击,它们的规模被缩小,有人甚至要求解散它们。这对于象我们这样需要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服务的国家尤其不利。我们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已经进行了改革,不应该再处罚它,要求它进一步改革。拉加经委会通过下列次级方案提供了宝贵的服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际贸易,发展资金筹措和运输,工业、农业、和技术现代化,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住区,统计和经济预测,妇女参与发展,区域一体化和合作,经济和社会规划以及人口。在所有这些领域,拉加经委会与美洲各国政府合作,研究和分析公共政策,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促进区域合作。

对于我们加勒比各国而言,必须充分维持拉加经委会,以便在上述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继续协助我们。提出这一点的背景是,加勒比地区正受到各种压力,莱斯特·伯德总理在7月6日加勒比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上叙述了这些压力。他谈到右翼人士准备以各种名目,例如有限主权和治外法权等名目将新殖民主义强加给加勒比共同体各国。事实上,由于对其生存几乎完全依赖生产黄色水果的国家施加压力,某些加勒比国家的经济生存受到威胁。

受到香蕉争端影响的多数国家是前欧洲殖民地,它们继续享有历史上享有的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对于它们经济生存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保护,加勒比共同体各国香蕉业将崩溃,导致严重的社会脱节,这种社会脱节最终将表现为政治灾难。

认识到香蕉生产对我们中一些国家经济的重要性,欧洲联盟有一个方案,根据该方案,其市场的一小部分保留给加勒比生产国,这个保留部分低于10%。这对大公司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几个多国公司仍然控制着60%的欧洲市场和70%的世界市场。然而,在5月13日的一篇社论中,鲍勃·赫伯特所作的以下论断似乎是正确的:

“对多国公司来说,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  
(《纽约时报》,1996年5月13日,A部分,第15页)

确实,对那些识字率在90%以上,并且从未听说过有政治犯的国家来说,如果由于香蕉工业受到破坏而使其社会经济遭到破坏,那将是灾难性的。

然而,今年3月在东京的发展战略会议上表达的观点上述抵消了局势的严峻性。与会者认为,存在继续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并使之有效的意愿。与会者一致认为,超出数学经济学的范围的问题,比如那些涉及贫困、环境、提高妇女地位和粮食安全的问题必须既在国家一级,又在国际一级加以处理。

然而,与会者指出,很多发达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财政困难,这严重限制了它们为国际组织的捐款的能力。因此,世界各国必须首先通过努力消灭贫困来应付贫困的挑战。第二,成功的关键显然在于各国联合努力制订和实施一项发展战略以应付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第三,在制订和实施一项新的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是给各国际组织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国的作用注入新的活力。

发展中国家非常关切的一个论点是:在努力获得充分的资源对,需要在其他政策领域,例如贸易或技术转让领域采取措施。此外,由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促进在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源和加强建立机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6年的人力开发报告中承认,虽然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空前的经济增长,人力开发的质量并不总是反映这种进展。很多发展中世界国家正在竭力应付贸易开放和全球化的影响的同时,这些社会中的个人正面临着相应的困难。可悲的事实是,只要国家之间有选择的自由化继续存在,这些国家中的个人就会更难避免急剧陷入贫穷的深渊。因此,不需要有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认识

到,任何希望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有责任进行建设人的能力方面的早期投资。

虽然可以确实地说,1990年代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世界的消失,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冲突是局部的,其势头似乎正由于种族、宗教和社会方面的考虑而增强。微观民族主义显然正在上升,这促进了分离主义考虑的滋长。存在着很多社会混乱、大规模饥荒和传染病的扩散。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实是:救助受害者往往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救济人员和救济品明显的日益缺乏安全。显然,需要遣散准军事集团、扫除地雷和加强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及建立和平工作。

必须忆及,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确保国家之间的和平。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准备采取超越《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步骤,并走向在规定时间内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对多种极严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必须是多学科性的,因为没有联合国机构能够有效地单独控制、平息和重建。

认识到该区域日益增加的国际犯罪活动的危险,因此,安提瓜和巴布达正在与邻国进行合作,并期待从双边和多边来源获得新援助,以开始执行一项全国毒品和洗钱管制政策。该政策的优先项目包括立法和行政管理改革、进一步加强截获活动、技术训练、预防性卫生和公共教育与培训。鉴于联合国系统的多层面特点,它特别能够处理毒品问题。

然而,本组织若单独工作,就无力对付这个涉及社会所有部门,影响到家庭、保健和经济活动的祸害。要想有成效地对付毒品这个祸害,就需要在各国之间进行更大程度的协调。如果对不仅将会毁灭我们社会的结构,而且会毁灭无数个人的生命的表现和作法没有一种统一的全球性处理办法,那将会严重损害某些国家所作的有力的和坚决的努力。

必须控制恐怖主义祸害。必须听取两个南亚国家发出的缔结一项反对恐怖主义国际公约的呼吁。恐怖主义

往往与毒品有关。东加勒比海各国不仅担心颠覆活动,而且对由于其国家被作为过境点而使其港口遭到严重侵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腐败行为感到关切。

最后,我想说,作为全球社会的代表,我们必须不辜负我们的选民寄予我们的信任。在我们寻求更好地管理我们的地球的方法时,多边主义必须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就共同生存的共同价值观念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的选民要求结束无意义的暴力和恢复同情和公平的概念。他们要求我们的对话具有创造性和前瞻性。

不同地区的人民必须准备作出牺牲,并抑制分裂人民的隔阂,如仇恨自私和怨恨。让我们不忘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位行政官员菲利普·文德拉说的话:

“通过暴力得到的东西需要更大的暴力来维持。那些说答案是流血人心里想的是别人的鲜血,而非自己的鲜血。”

然而,关于进展的基本需求依然是经济现实的基本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米歇尔·卡姆德苏斯6月24日提醒七国集团领导人:

“以发展援助被浪费为由拒绝提供此类资金的情况太多了。如果国际社会希望使最穷的国家免于边缘化,并使世界摆脱紧张和危机,那么它必须有力地同发展援助减少和所谓的捐助国疲倦现象作斗争。只要出现极度贫穷,紧张局势和危机肯定会随之而来。边缘化并非不可避免的,在这一全球化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有其机会。”

我国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机会的时代,在这一期间,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似乎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而且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改善。联合国应扎根于现实,并把涉及赤贫和社会不公正的危机问题放在国家和公共辩论的核心。

安提瓜和巴布达为联合国感到骄傲,并珍惜这一组织,而且我们认为,人们更多的是根据其失败而非其成功评价联合国,这是不公正的。但是,联合国在健康、人权、维

持和平活动、缓解灾难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记录。

联合国有能力在超出国家或区域当局影响的领域内取得成就。因此,组成这一机构的国家必须加强它们作出的集体承诺,以把这一远见化为现实。这样,我们将勇敢地把联合国推入21世纪的开端。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听取了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两个代表团已要求作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我谨提醒各位成员,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5分钟为限,而且各代表团应在各自的席位的发言。

凯贝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本来并不打算在此刻发言。我国代表团对苏丹外交部长在其政策发言中提及一个问题表示遗憾。安全理事会仍在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已为此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然而,不幸的是,苏丹政府今天继续仍藐视这些决议。

苏丹外交部长特别企图提醒大会注意的几点是苏丹展开的公共关系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行动并不相干,而且事实也没有使他企图描述的事物具有可信。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其与其各邻国的关系中奉行一项基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它国内政的睦邻友好政策。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埃塞俄比亚政府采取了一些它认为能够在促进本区域全面合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切实可行措施。然而,这项建设性政策的执行受到了阻挠,而且苏丹当局为了自己的目的滥用了我国作出的努力实现更美好未来的政治承诺。

苏丹政府滥用主权国家的特权发行苏丹外交护照和普通护照,帮助非苏丹籍恐怖分子自由地到埃塞俄比亚旅行。它利用其国家运输工具运送恐怖分子。它向恐怖分子提供了并且继续提供财政资源和避难所,并为恐怖分子提供了用来犯下这种懦夫行为的武器。

苏丹当局参与了1995年6月2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暗杀埃及总统的未成功企图,而且它继续阻挠正义,庇护与此暗杀企图相关连的受通牒的恐怖分子。这一事实一清二楚,在目前阶段不需作任何说明。非洲统一组织的所有有关决定以及安全理事会就此问题通过的三项决议清楚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声称有关嫌疑犯的证据和情况未提供给苏丹当局的说法是不真实的。苏丹政府已得到了有关的事实和证据,包括恐怖分子的名字、国籍和已知的地址。苏丹政府声称它已试图找到三名罪犯,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可信性。苏丹当局在暗杀企图之前、期间和之后,以及在收到埃塞俄比亚引渡嫌疑犯要求时都知道恐怖分子的下落。

从被逮捕者那里收集的证据以及物证不仅明确证实了苏丹当局的参与,而且证明了以下事实,即苏丹当局隐藏了三名因与暗杀企图有关而被通辑的恐怖主义分子,并向他们提供了庇护所。

关于在埃塞俄比亚对三名嫌疑犯的审讯,应当指出,国内立法,包括宪法规定可根据情况进行秘密审判是很常见的。此外,根据国际法,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道德上的原因,当审判涉及有关方面个人的生命利益时,或法庭认为,宣传将有损于审判时,允许将公众和新闻界排除在审判全过程或任何阶段之外。埃塞俄比亚法庭秘密审判三名被告的决定完全符合《埃塞俄比亚宪法》第20条的规定,而且完全符合国际法标准。综上所述,我国代表团认为苏丹代表在发言中提及审讯三名被判犯有上述罪行的恐怖分子是令人愤怒的和无法接受的。

最后,我们呼吁苏丹政府停止发起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回到负责守法的国家行列。我们也呼吁苏丹向埃塞俄比亚移交三名嫌疑犯,并表明它决心和承诺为真正的区域经济和政治合作而努力。这种合作能够确保我们整个区域的人民享有更美好的未来。

蒂奈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苏丹外交部长今天上午向大会所作的发言呼吁合作和团结。他谴责国家间的武装冲突,要求不干涉他国内政,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我国代表团要答复今天下午所说的一些话。我们本来并不打算这样做,但是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代表的错误言论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厄立特里亚代表的话把我们带回了冷战时期化。我要问厄立特里亚代表一个问题,厄立特里亚什么时候获得独立的?他声称苏丹早在1989年就开始对厄立特里亚的侵略政策,他对此如何解释?人所周知,苏丹为厄立特里亚人民提供了30多年的无限支持。事实上,这也包括支持厄立特里亚现任政府举行厄立特里亚自决公民表决,导致厄立特里亚在1993年独立。我们向兄弟的厄立特里亚人民提供这种援助并不期待回报。这是兄弟的责任。

关于提出苏丹30多年来已接受难民的问题的企图,我要补充说,在此期间,其中有的难民已经获得苏丹国籍。他们已同苏丹人民同甘共苦,在各方面加入了苏丹社会。我不需要在这里回顾,厄立特里亚在独立后借口缺乏吸收难民的必要基础设施,拒绝让厄立特里亚人返回家园——这一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完全了解。厄立特里亚不能在此承认,它让难民返回仅限于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其他人都不准。这公然违反关于难民问题的一切准则与规则。

国际社会已经通过关于国际关系的明确准则。这种准则以外的任何行为都是违反国际准则和标准的。1996年5月10日,厄立特里亚国家元首向国际社会和大众媒介,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和《经济学家》杂志宣布,他打算向苏丹反对派提供无限制的武装支持,以推翻苏丹政府。

大会如何看待一个允许其大使馆被用来作为另一个国家武装反对派的避风港的国家?这是文明国家的行为,还是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我仅回顾苏丹向安全理事会提供的关于厄立特里亚派遣部队攻击苏丹平民的情报。在厄立特里亚现任领导人曾经安全藏身17多年的同一地区发生了杀人、破坏财产和炸毁桥梁的事件。

现在我们又听到他们重新指责苏丹。厄立特里亚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合国中发言的唯一目的是以怨报德,尽管苏丹曾为厄立特里亚提供无限的支持。苏丹争取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是本地区稳定的唯一因素。

侵犯苏丹是一条死胡同,它既不符合任何一国的利益,也不符合该地区其他人民的利益。

关于埃塞俄比亚代表讲的话,我要在大会上阐明,在令人遗憾的刺杀埃及总统的企图发生之前,我国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很好的。苏丹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起谴责刺杀埃及总统的企图。甚至在暗杀企图30多天后,两国关系仍然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对埃塞俄比亚的立场发生急剧转变和它对苏丹的指责感到吃惊。埃塞俄比亚声称,这些指控是由他们关押的罪犯提供的,他们随后对这3名罪犯进行了秘密审判,而安全理事会本身却拒绝了这3个所谓罪犯的指责。

我想我们有权利问:被被关押者指控从事恐怖主义的苏丹,难道就没有权利当面责问其指控者,或者得到这种招供的案文?既然安全理事会根据同样的指控对苏丹实行制裁,国际社会就没有资格取得这种案文?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正当的。

我国外交部长的发言绝没有超出正当的范畴。我们认为,埃塞俄比亚代表关于有不利于苏丹的有力证据的话是没有根据的。安全理事会从来没有看到证明埃塞俄比亚的指责或其真实性的一点证据。

我要对埃塞俄比亚代表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如下:苏丹已经并且继续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各种支持,包括防止从苏丹领土内对埃塞俄比亚的任何侵略行动,难道这不足以确保得到埃塞俄比亚的合作,或者至少提供苏丹要求提供的有关正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所谓罪犯的情报,更不用提非统组织也要求提供这样的情报?

#### 工作安排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各位成员,将在10月31日星期四上午审议题为“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8个成员”的议程项目15分项目(b)。

下午6时散会。